

柏拉图与帝国问题^{*}

——基于《法义》的考察

张文涛

摘要:柏拉图的古典政治哲学思想主要建基于古希腊的城邦政治经验,其理想政治体的大小也不出城邦规模。不过,这并非意味着柏拉图没有关于大国、帝国或普世社会问题的思考。实际上,无论传说中荷马笔下的特洛伊战争,抑或柏拉图之前的希波战争,还是柏拉图时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些战争都在促使柏拉图思考大国或帝国,反思德性、自由与帝国和普世社会的关系等重大问题。通过考察柏拉图在《法义》卷三从历史角度对城邦和政制的起源及发展的探究,以及卷四从地理角度就陆地、海洋与德性之关系的思考,可以清晰看到柏拉图对于帝国问题的充分反思和对雅典帝国的批判态度:帝国并非好的政治体,即便建构起来也必然毁坏;建立于海洋霸权而非德性基础上的雅典帝国则是这种败坏和毁灭的典型。

关键词:柏拉图;城邦;帝国;《法义》

DOI:10.11714/jssu.sse.202605013

引言:柏拉图与普世社会问题

与中国的历史相比,西方历史有一较为明显的特征,即比较缺乏大一统的治理经验,虽然西方历史上不乏各种帝国经验,以及诸多关于普世社会的理论想象。就古希腊而言,一般认为,亚历山大帝国的出现,才使得西方人第一次有了大一统的政治实践经验,但它不过是昙花一现^①。在此之前,由于实践经验的缺乏,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政治哲学家,对于理想政治体或最佳政制的构想,完全局限在城邦范围。

粗略地看,上述看法没有问题。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构想的理想国家,的确只是一个小小邦国。不过,如果以为柏拉图这种政治理念源于他对大国、帝国或普世社会缺乏思考,恐怕就有失草率了。毕竟,就帝国经验而言,无论是东方的波斯帝国还是雅典自身的民主帝国,都是柏拉图当时思考理想政制问题的直接背景。因此,对于上述粗略看法,可能必须要作一个重要补充:柏拉图的理想城邦观念,应该被视为他对帝国或普世社会问题进行有意识反思和批判的结果。实际上,20世纪著名的柏拉图研究者施特劳斯在其1957年的《理想国》讲疏稿中,就专门谈到过这个问题:

^{*} 收稿日期:2026—04—08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人文学核心问题的文献整理与理论反思”(2025CDJSKDPT05)

作者简介:张文涛,重庆大学哲学系(重庆400044)。

① 关于亚历山大与西方古代的大一统问题,参见刘小枫为德罗伊森《希腊化史》中译本所写导言《亚历山大与西方古代的“大一统”》。[德]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著,陈早译:《希腊化史:亚历山大大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5页。

一个由不同国家或城邦组成的社会应该是存在的……这个提议被柏拉图默默地否决了。当然,常见的答案是,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无知。依照这种思想路线,柏拉图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可能性……我认为人们能够证明他对于此事是有所思考的……一个由所有理性的人组成的社会的概念已经出现在柏拉图那里,你只需读一读《治邦者》中的神话就知道了。^①

施特劳斯的看法是,柏拉图对于“由不同国家或城邦组成的”帝国或普世社会是否可能的问题是有明确思考的,他最终钟情于城邦并非出于对该问题的无知。施特劳斯在这里提到了柏拉图《治邦者》中的神话,但并没有展开。柏拉图在这个著名的“颠转的宇宙”神话中说道,人类曾经生活在一个为克罗诺斯神所直接管理或牧养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由于不用操心生计和治理问题而拥有大量“闲暇”,于是可以通过“逻各斯”(或译言辞、理辞)在人与人之间甚至人与野兽之间进行普遍交往,即普遍地“研究哲学,并通过对每一物之自然的探究来学习”,如果是这样,柏拉图说,那个时代的“幸福”要比当今时代“胜过一千倍”(参《治邦者》272c)^②。于是,神话中克罗诺斯治下的这个“黄金时代”,可以说就是一个“只有哲人一种居民”^③的普世社会,这便是施特劳斯前述“一个由所有理性的人组成的社会的概念已经出现在柏拉图那里”这一看法的来源。可是,柏拉图真的认为这种“由所有理性的人”或“哲人”组成的“普世社会”存在过或可能存在吗?在神话中这一可能性本身就是模棱两可的(可参《治邦者》272d),更何况神话的言说方式等于直接否定了它的现实可能性。道理很简单,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类早已不再受神的直接照看和牧养,而必须自己操心自己的生计和治理。所以,即便柏拉图在《治邦者》中触及过一种具有普遍理性特质的普世社会之观念,但关于它的神话言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意在否定这一普世社会的现实可能性。

无论如何,施特劳斯的上述看法提醒我们,认为希腊思想家必须要等到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近东缔造出亚历山大帝国时,才意识到有帝国或普世社会的存在问题,这种看法确实过于失察了。从城邦或小国出发,通过战争和征服走向大国、帝国或普世社会,这当然会“造成道德问题,这一点对于任何具有正常智识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很难想象诸如柏拉图、色诺芬等具有超常智识的人却无法看到这一点”^④,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不过,前述《治邦者》中的简短段落还不足以呈现柏拉图在这一点上的全面看法。本文将通过仔细考察《法义》卷三等篇章,来深入剖析柏拉图对于帝国或普世社会问题的批判性思考;这一剖析可以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柏拉图之所以将其最佳政制构想局限于城邦的深刻缘由,同时也可以获得对施特劳斯上述看法的深入理解。

一、从小邦到大邦

柏拉图的哲学写作少有历史性质的内容,但《法义》卷三是个例外。该卷提供了非常难得的篇幅,展示了柏拉图关于政制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学—考古学性质的探讨。柏拉图之所以作这种方式的写作和思考,很有可能是有意与雅典史学家修昔底德进行对话。施特劳斯便认为,柏拉图虽然没有写作史书,但他其实简要描绘过一幅涵盖太初之野蛮到伯里克利民主时期的历史草图。施特劳斯指的就是《法义》

①④ [美]列奥·施特劳斯讲疏,[美]彼得·阿伦斯多夫整理,肖训能译:《哲学与城邦:柏拉图〈王制〉讲疏》,北京:华夏出版社,2026年,第154,155页。

② [古希腊]柏拉图著,洪涛译:《政治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页。《政治家》一译《治邦者》。

③ [美]罗森著,陈志伟译:《柏拉图的〈治邦者〉:政治之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4页。

卷三,在他看来,“《法义》卷三是柏拉图作品中惟一跟修昔底德史书进行明确对抗的部分”^①。该卷的历史考古内容非常丰富,就算将之与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篇首章的仅仅前20节——这20节也是修昔底德关于“希腊性”的历史学—考古学性质探讨——进行对比,也会有很多发现。这里我们主要循着柏拉图的文本脉络,关注柏拉图在描述政治生活、城邦和政制出现的过程中,从“历史”和“自然”角度出发所讨论的一些问题。

众所周知,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或苏格拉底采取了一种所谓的“大写”视角,以便更好看清“小写”的正义。于是,苏格拉底着手建构城邦,而且是从一种居于“自然状态”的猪的城邦开始^②。《法义》卷三与此类似,为了看清楚人类政制和立法的起源,柏拉图也采取了一种“大”的视角,这便是长时段历史的视角——即考察一段“无限长的时间”,一段“漫长的、无法估量的”时间(《法义》676b)^③。采取大的、长时段的视角有个好处,在此视角下,观察者可以看到无数城邦和政治体的变化兴亡:

难道我们不认为,在这段(漫长的、无法估量的)时间里,曾出现过千百万城邦,而且也有数量相当的城邦毁灭过?往往,各种政制岂不都曾统治过一个地方?有时小城邦变成大城邦,有时大城邦又变成小城邦;好城邦变坏,而坏城邦变好,难道不是吗?(676b10-c5)^④

理解了这些变化的原因,也就明白了政制和立法的起源和转变(676c10)。城邦、政制和立法——这些构成了“文明”的标志和核心,所以柏拉图在《法义》卷三中关于城邦、政制和立法的历史性探讨也可以说是一种关于“文明”起源的探讨。这一探讨,正如我们在许多关于上古文明的起源叙事中看到的那样,也是从设想一次“大洪水”开始的。洪水切断或毁灭了前一次文明,导致了一种自然状态的出现。接下来,新的文明在此状态下逐步产生,在这一过程中,城邦及其政制呈现出阶段性演化的特征。

柏拉图一共讲述了四个阶段中分别出现的四种政制或城邦(到了最后即第五个阶段也就来到了现实中的斯巴达和雅典)。第一阶段发生在山顶。洪水退去之后,原初的准政治生活和准政制慢慢出现。“内战和战争在那个时期都消失了”(678e),此时也可称之为“自然状态”阶段,它可以视为对《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所假设的猪的城邦所代表的自然状态的扩大版呈现。这也是一个氏族时期,这时的生活方式或准政制形式乃是原初的父权制或君主制,也就是荷马所描述的独目巨人库克洛普斯族的生活方式:“没有议事的集会,也没有法律,他们居住在挺拔险峻的山峰之巅,或者阴森幽暗的山洞,各人管束自己的妻子儿女,不关心他人事情。”^⑤柏拉图评论说,这个时期的“父亲法律的统治”是“一切君主制中最公正的君主制”,因为“最年长者凭借父母传承下来的权威进行统治,其他人服从他,就像鸟儿们聚成一群”(680e),这种统治方式的正当性完全出于自然。

第二阶段发生在山麓。众多氏族联合起来,城邦(国家)、政制、立法都开始真正出现,于是真正意义

① [美]施特劳斯:《修昔底德:政治史的意义》,[美]施特劳斯著,[美]潘戈编,郭振华译:《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157页。另参[美]施特劳斯著,黄俊松译:《城邦与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第255页。另外,柏拉图对修昔底德的有意回应还可见于其短篇对话《默涅克塞诺斯》以及《阿尔喀比亚德前后篇》等对话中对阿尔喀比亚德形象的塑造。

② 关于苏格拉底从一种不同于现代政治哲人霍布斯所假设的“自然状态”出发探讨合宜政治制度的建构问题,参见张文涛:《柏拉图笔下的“自然状态”问题》,《海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③ [古希腊]柏拉图著,林志猛译:《法义》,北京:华夏出版社,2023年,第131页(676b)。译文据原文有所调整。下面引用《法义》皆随文夹注标准编码,不再一一出注。

④ 可比较希罗多德《历史》开篇不久关于漫长的历史时间中人类政治体的大小、强弱之变迁的论述。[古希腊]希罗多德著,徐松岩译注:《历史》(详注修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5页(卷一5.4)。

⑤ [古希腊]荷马著,王焕生译:《奥德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56页(第9卷第112—115行)。

上的“文明”形成了,这时的政制是贵族制或“源于父权制”的君主制(681a-d)。第三阶段发生在平原。诸多小城邦联合起来形成更大的城邦或城邦联盟,这里柏拉图指的其实就是荷马史诗所描写的特洛伊战争时期。关于这第三个阶段或第三种政制形式,柏拉图一开始就说道,“政体和城邦的一切形式与经验都出现在这种政制中”(681d)。柏拉图的意思颇有些不易理解,为什么说这个阶段的政制包含了城邦的一切形式与经验?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这个阶段出现了实行各种各样制度的城邦及其联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前两个阶段都没出现的“战争”,在第三个阶段出现了。“战争”的到来,对于雅典异邦人或柏拉图在长时段历史视角下考察城邦和政治体的变化兴亡至关重要;正如在《理想国》中,导致自然状态下的猪的城邦走向寓意现实中之雅典的发烧的城邦,战争仍然是关键因素。

在描述第三阶段时,柏拉图仍然借助了荷马史诗,但是对荷马笔下的特洛伊战争及其后果进行了新释或重述。柏拉图说,战争其实是特洛伊一方挑起的,而特洛伊乃是当时的东方大帝国——亚述帝国的一部分,特洛伊受到后者的支持“鲁莽地”挑起了战争(685c)。所以从这个角度说,第三阶段其实已经包含有“帝国”这种政体和制度的经验了,只不过它是间接性的。战争中的希腊人这一方距离大洪水时代已经非常遥远,所以那场灾难已经被“忘得一干二净”,于是“人人都能无所畏惧地利用大海了”,从而“从海上出发”,对特洛伊发动了一次“军事远征”(682c)。这场远古时期从海上出发的军事远征,显然也让人联想到柏拉图所处的现实,即不久前雅典帝国的西西里远征,而这里涉及的海洋问题我们后文再讨论。

战争打了十年,最后希腊人或阿开奥斯人攻陷了特洛伊。接下来,柏拉图便讲述了特洛伊战争之中和之后所发生的其他事情,其长时段历史的叙述也从第三阶段逐渐往第四阶段过渡:

在此期间,在伊利昂遭围攻的这十年中,由于年轻人的反叛,许多不幸降落到了每个围攻者的家中。当士兵们回到母邦和家中时,他们没有受到这些人的隆重接待,也没有受到公正对待,而是大量遭到处决、屠杀和流放。当流放者们卷土重来时,他们改了名,将阿开奥斯人改名为多里斯人,因为,在他们流放时,多里欧斯这个人把他们聚集起来。(682d-e)

柏拉图这里的叙述,与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一中的叙述非常相似^①。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阶段中,“外战”和“内战”都出现了。战争瓦解了某些东西,比如特洛伊遭到了毁灭;同时,希腊人或希腊文明的“阿开奥斯人”这第三个阶段和传统也遭到了毁灭。战争也导致了新的阶段和政制的出现,这便是紧接着的第四阶段。

三、帝国或准帝国及其败坏

按柏拉图的讲法,特洛伊战争之后希腊人的新领袖多里欧斯把战后归乡遭难的士兵们重新组织起来,打败了阿开奥斯人,夺回权力,恢复了政治秩序,希腊人的族群名字也从阿开奥斯人变为“多里斯人”。实际上此时多里欧斯是完全有能力把全希腊凝结起来缔造成一个“帝国”的。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把由他统一起来的军队一分为三,“通过统一的安排而分配给三个城邦,城邦的君王是亲兄弟,都是赫拉克勒斯之子”(685d),这就是阿尔戈斯、墨塞尼和斯巴达三个国家(或“民族”,683a)的来历(《法义》中雅典异邦人的两位对谈者之一墨吉罗斯即来自斯巴达)。根据柏拉图的行文,多里欧斯之所以没有这么做,即没有直接缔造帝国,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多里欧斯和他的士兵们对特洛伊人所隶属的那个亚述

^① 参考第1卷第12节。[古希腊]修昔底德著,何元国译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0页及注释9。

帝国、那个“联合组织”感到“不寒而栗”，恰如当时的雅典人对伟大的波斯君主感到恐惧一样(685c)。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作为亚述帝国之一部分的特洛伊看似强大，仍然在希腊人的攻打下沦陷了。换言之，帝国再强大也难逃最终覆灭的命运。所以，多里欧斯或许从亚述帝国和特洛伊那里吸取了教训，而在帝国问题上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

尽管如此，一分为三的三支军队也形同一支军队，君主为三个亲兄弟的三个城邦国家，也可以说形同一个巨大的城邦国家。所以，多里欧斯的分配所产生的三个城邦国家，其实仍然构成了一个帝国，或者说一个具有国家联盟性质的“准帝国”。这个准帝国一度非常强大：

该安排是个好的发现，这个组织形式优于远征特洛伊军队的组织形式。因为，首先，人们认为，赫拉克勒斯的儿子们作为统治者，好过珀罗普斯的后裔。其次，在德性上，他们这支军队被认为优于远征特洛伊的军队。(685d)

这个准帝国内部的三个成员曾“辛勤劳作，患难与共”，同时也求神问卜，希望得到神的护佑(686a)，他们简直是“希腊人手中十全十美、令人惊叹的所有物”(686d)。由此，柏拉图说：

(他们)岂不会让军队牢牢团结在一起，并一直保存军队，以便统治他们想统治的其他任何人，维持他们本身的自由，并使自己子孙后代都能为所欲为，随意摆布全人类，无论希腊人还是外邦人？这岂不就是人们称赞这些东西的原因？(687a-b)

维持“自由”，“为所欲为”，“随意摆布全人类”——通过柏拉图的这些用语，多里斯人这个由国家联盟而来的政治联合体的“帝国”本质已昭然若揭。施特劳斯也瞅准这些关键描述而解说道：

人们期望，通过高贵地使用大规模而壮观的军队便能够使自己幸福。他们所理解的幸福，就是自由和帝国——按照他们的意思去统治许多人，不管是希腊人还是外邦人，好让统治者及其后代能够随心所欲地做一切事情。^①

和任何帝国一样，多里斯人的这个帝国或准帝国，内在地包含着一种“自由”与“奴役”的永恒悖论或困境，恰如著名柏拉图学者伯纳德特在解读《法义》这一明显含有帝国批判意图的段落时所揭示的：

为了使战争中的胜利能够与永恒战争这个前提达成一致，唯有让胜利者最终拥有一个普世帝国，如果这个帝国要获得自身的自由，那么，它首先要付出的代价是令所有其他人丧失自由，而它最后要付出的代价是令它自身丧失自由。罗马是这场运动的完美例子。^②

这个准帝国在初期还是有很多制度上较好的建设和创新，比如对内即在每个城邦内部，都注重土地和财产分配上的平等，让居民的债务在解除和重负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对外或者说在三个城邦之间，则互相监督和帮助(684d, 684a)。但尽管如此，这个准帝国或三个城邦之中的两个(阿尔戈斯和墨塞尼)还是很快就败坏了，只有斯巴达一直存留下来。败坏的原因，雅典异邦人或柏拉图谈论了很多，而说到底，“君王们和整个计划遭毁灭的原因，并不在于统治者或那些适合被统治的人胆怯或缺乏战争知识。败坏源于其他各种邪恶，特别是对最重要的人类事务的无知”(688c-d)。之后，《法义》卷三的历史学—考古学探究就来到了当下时代(或者说第五阶段)。斯巴达没有败坏和毁灭的原因，在于其君主制实际上同时包含了君主、贵族、平民的要素，因此其“君主制变成了恰切要素的混合体，并取得了合宜，它保存了自身，也是保存了其他东西的原因”(692b)。

卷三接下去的篇幅，重点讨论了历史上波斯君主制的败坏(走向了过度的“奴役”)和当下雅典民主

① [美]施特劳斯著，程志敏等译：《柏拉图〈法义〉的论辩与情节》，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46页。

② [美]伯纳德特著，叶然译：《发现存在者：柏拉图的〈法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67—168页。

制的败坏(走向了过度的“自由”)的各自缘由。其原因都在于教育——波斯君主制的败坏源于王子受到错误的后宫教育,雅典民主制的败坏则源于雅典民众受到新兴诗歌和音乐的错误教育。教育的失败使得波斯的君主制蜕变为僭主制、成为帝国(所以在柏拉图这里“君主制”和“帝国”实应分开对待),而诗教、乐教对雅典民主制的败坏,则让后者对“自由”的追求走向无政府,走向了彻底的无序和混乱。柏拉图最后说道,民主雅典的终极归宿,必然是进入一种终极的邪恶状态:

紧接着这种自由出现的是,不愿意听命于统治者,而后是拒绝父母和长者的束缚和引导;迈向终点的前一步是,企图不必服从法律;接下来就到达了终极自由,他们不再考虑任何誓言、许诺和有关诸神的东西,反而展现和模仿所谓古代提坦神的自然本性——再次返回相同的状态,进入一个邪恶从未断绝过的恶劣时期。(701b-c)

这样,柏拉图在《法义》卷三的末尾暗示,前述长时段、大历史视角下所考察的文明,可能再一次走向毁灭。只是,导致这一轮文明毁灭的原因不再是大洪水之类的纯粹自然灾害或机运,而是人类自己德性的败坏。由此,《法义》卷三整篇首尾相接,堪称柏拉图关于“文明”或“历史”的一轮“循环性”演进的完整哲学探究和叙事。

四、海洋、陆地与德性

柏拉图在《法义》中对帝国问题的审视,除了体现在卷三的历史—考古学探究中,也体现在卷四开篇关于海洋与德性之关系的思考中。若将《法义》卷三的历史考古与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一前20节的历史考古作整体比较,一个要害就是“海洋”问题。众所周知,希波战争之后,雅典依靠海洋、海军、海权而扩充为一个民主制“帝国”,直至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①,修昔底德的考古显示出希腊人和雅典人如何通过海洋、海军一步步走向强大。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后面著名的伯里克利葬礼演说以及雅典人入侵米洛斯岛的演说中,我们都能看到雅典民主帝国所主动展示出的“海洋霸主”形象。反观柏拉图,从《法义》卷三到卷四,可以说都在有针对性地否定海洋的重要性,这种否定无疑体现了柏拉图对雅典民主帝国的批判态度^②。

如果说《法义》卷三具有一种“历史”性质,卷四的开篇则是从“地理”角度出发的。卷四开篇先讨论了建立殖民地的选址问题。在雅典异邦人看来,自然地理条件和距离海洋的远近,这二者均关乎未来殖民地城邦民的德性好坏:

尽管靠近大海的陆地能获得日常的满足,但大海确实是“又咸又苦的邻居”。大海使一个地方盛行买卖和随零夏而来的逐利,让灵魂养成诡诈和不信任的性情;因此,大海卷走了一个城邦对自身和其他人的信任感和友好感……大量出口,结果就是金币银币泛滥成灾。总之,可以说,对于一个要取得良好出身和正派性情的城邦,没有什么比这危害更大了。(705a-b)

在雅典异邦人或柏拉图看来,城邦和社会依靠便利的海洋贸易会积累起大量财富,而这会慢慢腐蚀邦民的德性,败坏其性情。不妨比较《高尔吉亚》中,苏格拉底对顽固的卡利克勒斯说的下面这番话:

① “海权”(thalassokratia, thalassocracy, 海洋力量、海洋帝国)对于古希腊尤其是雅典民主帝国的重要性毋庸赘述。但是,古希腊人对此是有各种看法和争论的,关于古希腊“海权”观念的简要精炼的思想史梳理,参见[意]莫米利亚诺:《希腊思想中的海权》,林国华等主编:《海国图志第3辑:古代世界的自由与和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3—35页。

② 在施特劳斯看来,伯里克利治下的雅典民主帝国可称为一种“城邦普世主义”。[美]施特劳斯著,黄俊松译:《城邦与人》,第244—254页。

(城邦)之所以臃肿并在内部溃烂,恰恰是因为那些古人,人们却感觉不到。因为他们已经毫无节制和正义地用港口啦、船坞啦、城墙啦、贡税啦以及诸如此类的废话,填满了城邦。那么,一旦无力之症发作,他们就会责怪那时在场的建议者们,却会赞美忒米斯托克勒斯、喀蒙和伯里克利,即那些应该对这些恶果负责的人。(《高尔吉亚》518e-519a)^①

柏拉图这里所批判的“古人”,当然就是希波战争之后让雅典依靠海洋霸权而强势崛起的那些前人,尤其是以忒米斯托克勒斯和伯里克利为代表的雅典民主帝国的缔造者。可以说,柏拉图关于海洋、财富和德性三者之关系的负面性看法,等于抽掉了波斯战争之后希腊人尤其雅典人的立国之本。

以上涉及的大致是“和平”时期的海洋问题。对于“战争”时期海洋对德性的贡献,柏拉图仍然持否定态度。当雅典异邦人得知他正为之立法的殖民地不产什么好木材时,认为这是好事,因为这样一来殖民地居民就不能轻易去“模仿”敌人,模仿那些善于利用海洋、喜欢侵略、剥夺他人自由的敌人。接下来,柏拉图便通过雅典异邦人之口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看法:忒修斯,这位传说中的雅典国王和雅典城邦国家的奠基者,当年如果没有把雅典从海洋强敌米诺斯的手中解救出来,可能反而会更好:

当时米诺斯将某种残酷的进贡强加给阿提卡居民。米诺斯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而阿提卡人并没有像今天那样拥有战船,他们也没有一块备有造船木材的好领土,能使他们轻易地发展海军力量。结果,他们无法通过海上的模仿立马变成水手,在那时保卫自己、抵抗敌人。他们一次次失去七对少男少女会更有利,如果那样做的话他们能保持稳定,用重甲步兵取代采用水兵的习惯。(706b-c)

这一看法足以反映出对于依靠海洋而强盛的雅典民主帝国来说,柏拉图有多么“反动”。另外,在《默涅克塞诺斯》这篇对话中,苏格拉底假借伯里克利情妇之口说道,希腊的敌人、波斯帝国的君主“大流士不仅在陆地上将帝国边界一直划到斯基泰,而且用舰船主宰了大海和众多岛屿,以至于没有人敢于与他为敌,所有人的思想都被奴役了,波斯帝国就是这样奴役了众多强大尚武的民族”(《默涅克塞诺斯》240a)^②。柏拉图的意思显然是,雅典不能学习它的这个强化海权的帝国敌人。因此,与在海洋、财富和德性三者之关系上持负面性看法一样,在海洋、战争和德性三者之关系上,柏拉图仍然持一种负面看法:

水兵能迅速地向前跳跃,然后再快速地退回到自己的船上;他们不敢站在进攻的敌人面前决一死战,根本不认为这是可耻的。他们很容易为此找到借口,并时常准备扔掉武器逃跑,他们宣称,某些溃败并不可耻……人们绝不应该习惯于这些邪恶的作风,尤其是公民中最好的部分。(706c-d)

如果我们比较《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一考古篇中关于希腊人的“海盗”前辈的种种描述,就会发现修昔底德的态度完全是客观性的,并没有柏拉图这种出于德性关怀的海洋批判。《法义》接下来还引用了《伊利亚特》中奥德修斯反对阿伽门农命令将船只拖入海里的段落,表明奥德修斯此举具有恰切的德性关怀(706d)。对于城邦民德性的培养来说,海洋是更有害的,陆地才是更有利的——柏拉图的这一看法,还典型地体现于《法义》中他对“希波战争”的重新评价:

马拉松和普拉泰亚的陆战:前者开始拯救希腊,后者完成了拯救。此外,我们还认为,这些战役使希腊人变好,而其他那些战役没有使他们变好——倘若我们可以这样谈论当时使我们获得拯救的战役。因为,对于你提到的萨拉米斯海战,我会加上阿特米西翁海战。(707c)

① [古希腊]柏拉图著,李致远译:《高尔吉亚》,刘小枫主编,李致远、叶然等译:《柏拉图全集·中短篇作品》下,北京:华夏出版社,2023年,第1077页。

② [古希腊]柏拉图著,李向利译:《默涅克塞诺斯》,刘小枫主编,李致远、叶然等译:《柏拉图全集·中短篇作品》下,第1195页。

柏拉图的态度异常鲜明:真正拯救了希腊的都是陆战而非海战。显然在他看来,真正的拯救不只是军事上的胜利,更在于德性上的完善。海军、海权、海战确实带来雅典的富强和帝国的崛起,但同时也会让雅典帝国在德性上越来越败坏,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因此不难理解,给希腊人带来无上光荣、同时也导致雅典帝国崛起的萨拉米海战,何以在柏拉图这里会遭到极大的贬抑。

实际上在前面卷三中,柏拉图就已经高度评价过当年雅典和斯巴达联合起来抵抗波斯敌人的马拉松重装步兵陆战了:

倘若雅典人和拉克岱蒙人不曾共同决定抵抗逼近的奴役,那么,此时的希腊种族就可能全都混杂在一起,希腊人中就会有外邦人,外邦人里也会有希腊人,就像当今波斯人压制着的各族人,他们在分散而又聚合之后,不幸地散居着。(693a-b)

在《默涅克塞诺斯》中,柏拉图像在《法义》卷三、卷四中一样,又讲了一遍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共同打赢的马拉松战役,并评论说正是在这场陆战中彰显出来的“德性”,才使得他们成为希腊人的“指挥官和老师”(《默涅克塞诺斯》240d)。所以,“必须把最高奖授予那些参与马拉松之战的人,而把次奖授给那些在萨拉米附近和阿尔特米希昂参与海战并获胜的人”(《默涅克塞诺斯》241a)。我们看到,在对希波战争历史的重新评价中,柏拉图态度鲜明地抬高马拉松陆战,贬低萨拉米斯海战。作为对比,可以注意的是,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一第23节中评述希波战争时所说的,“那场战争在两次海战和两次陆战中就迅速决出了胜负”——依据注家的解释,修昔底德甚至都没有把柏拉图如此看重的马拉松战役算在希波战争之内^①。

在探讨海洋问题时,柏拉图看重的是海洋与德性的关系,而非像现代人如格劳秀斯等看重海洋与自由的关系。从柏拉图的《法义》《默涅克塞诺斯》这些著作出发,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一种可以对抗“现代海洋自由论”的“古典海洋德性论”。格劳秀斯式的现代海洋自由论可谓现代“帝国”或帝国主义的一种理论支撑;反之,柏拉图式的古典海洋德性论则可谓对古典“帝国”或帝国主义的一种理论批判^②。

结 语

总之,从传说中的特洛伊战争到历史和现实中的希波战争及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些战争使得柏拉图有机会面对各式帝国——特洛伊战争之后希腊人造就的国家联盟性质的准帝国、希波战争前后的波斯君主制或僭主制帝国、希波战争之后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的雅典民主制帝国,从而得以广泛地反思德性、自由与帝国或普世社会的关系等重大问题。

最后,有个问题需要予以补充说明。在本文中,“帝国”“普世社会”或“普世帝国”几个概念基本上是等价性的,可以通用,它们是不同的国家的普遍性联合,亦即施特劳斯前述引文中所说的“由不同国家或城邦组成的社会”。这一等价性暂时排除帝国或普世社会是如何达成或实现的问题(比如是通过殖民、征服还是通过联盟),也暂不考虑其内部诸单元或诸成员之间是否平等的问题,而是基于其最基本的特征——普遍性或普世性,即它们乃是由不同的(在终极意义上是由所有的)国家(就古希腊而言即城邦)或政治体(当然也就包括不同的族群或民族)所构成的。从山顶最初的小族群,到山麓的小邦国,再到平

① [古希腊]修昔底德著,何元国译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8页注释4。两场陆战指温泉关战役和普拉泰亚战役。关于柏拉图与修昔底德就这些战争之判断的鲜明对照,也可参见[美]施特劳斯著,黄俊松译:《城邦与人》,第255—256页。

② 柏拉图的海权批判对后来的罗马史家影响很大,可参[意]莫米利亚诺:《希腊思想中的海权》,见《海国图志第3辑:古代世界的自由与和平》,林国华等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4页。

原的城邦联盟,柏拉图让我们看到,“帝国”是如何在扩大、征服和联合中逐步出现,成为一种(哪怕是短暂的)“普世社会”的。

“普遍”或“普世”的意思是,这种大的乃至尽最大可能的联合,要么超越了单一的城邦或国家(比如雅典民主帝国及前述多里安人的联盟),要么超越了单一的民族(比如波斯帝国),要么最终同时超越二者(比如前引《法义》687b所说的、最终欲“摆布全人类,无论希腊人还是外邦人”的多里安人联盟)。当然,统治“全人类”这一彻底的普世性,只体现于帝国的意志及其指导下的帝国行为指向;至于它在实践上是否可能,则是另外一回事了。但“帝国”的本质就是“普遍”或“普世”的,这是由其无尽扩张的本性所决定的,而这一本性的根源则在于人性中“欲望”的无尽欲求本质:“欲望”在本质上并没有自我约束或限制的能力,只能受到外在于自身者(理性和血气)的约束或限制,这一点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分析“欲望”的本性时得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看法(参《理想国》439a-441a)。因此,如果我们假设雅典赢了伯罗奔尼撒战争,那么有理由相信,雅典帝国最后一定会欲求超出希腊民族的界限,而不仅仅是超出希腊城邦国家的界限。当然,众所周知,历史上雅典帝国没有做到的事,后来都由亚历山大帝国实现了。

总之,通过考察柏拉图在《法义》卷三从历史角度对城邦和政制的起源及发展的探究,以及卷四从地理角度就陆地、海洋与德性之关系的思考,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柏拉图对于帝国问题的充分反思和对雅典帝国及普世社会的批判态度:帝国并非好的政治体,即便建构起来也必然毁坏;建立于海洋霸权而非德性基础上的雅典帝国则是这种败坏和毁灭的典型^①。这些反思和批判,让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为何柏拉图会将其关于理想国家和政制的构想限制在城邦的范围之内。

Plato and the Problem of Empires: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Laws*

Zhang Wentao

Abstract: Plato's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ical thought grows out of ancient Greek city state experience, with his ideal political community limited to the scale of the polis. Still, he did reflect on large states, empires and universal societies. The Trojan War, the Greco Persian Wars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 drove Plato to probe imperial issues and reconsider the vital connections between virtue, freedom, empire and universal society. Drawing on the historical account of city state and constitutional origins in *Laws* Book III, and the geographical analysis of land sea contexts and virtue in Book IV, this paper unpacks Plato's critical reflection on empire and the Athenian Empire. Empire is inherently defective and bound to collapse even if founded. The Athenian Empire, resting on maritime hegemony instead of virtue, exemplifies such corruption and downfall.

Keywords: Plato; city-state; Empire; *Laws*

【责任编辑:全广秀;责任校对:全广秀,张慕华】

^① 有论者以为,柏拉图在《法义》等对话中所表达的哲学思想堪称一种“普遍的哲学宗教”,为希腊及西方人提供了一种“通过普遍的法则将单个人结合在一起”的“广博而大全的世界”之“普遍世界”政治图景,这种看法真是错得离谱。参见[德]克爾斯特:《古人的天下观及其政治与文化含义》,刘小枫编,杨志城等译:《西方古代的天下观》,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年,第122—123页。如果说在希腊或雅典的古典时期真的出现过一种关于帝国或普世社会的正面思想,那么寻找这种思想来源的恰当地方可能在修昔底德而非柏拉图。参见[美]施特劳斯著,黄俊松译:《城邦与人》,第246—247页。